一地兩檢方案何來違法之理？

何子文

熱門話題

政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高鐵在通關方面將採用深圳灣口岸「同層兩檢」模式，旅客只須在同一樓層，便可完成入境或出境手續。這個方案按照「三步走」的方式推進實施，經過人大常委會批准和本地立法程序授權，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完全符合「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的規定，不存在任何違反法律規範的問題。

一地兩檢最具效益

這個安排是最能夠發揮高鐵效益的安排，也是最便利市民的安排。然而，反對派卻將在全世界多個地方都採用的「一地兩檢」安排指為「割地」，表示將會反對到底云云。在「一國」之內，採取國際通用的「一地兩檢」，竟然說成「割地」，盡顯反對派邏輯混亂，為反而反。社會各界應深入理解方案，消除誤解，免受誤導，理性討論，凝聚共識，敦促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方案，讓高鐵如期通車。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全長26公里，落成後可以將香港往返廣州的時間由2小時縮短至48分鐘，並且將香港乘客接送到內地的高鐵網，直達內地各大城市。據估計，高鐵香港段50年內乘客年均可節省3900萬小時，經濟效益更是難以估量。高鐵要發揮最大效益，關鍵是必須盡量發揮其快速和便捷的特點。在技術上，高鐵已經十分成熟，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通關安排。高鐵落成後可縮短香港到廣州個多小時的車程，但如果在過關時花費過多時間，變相是將高鐵的效益完全抵銷，整個高鐵工程的價值也會大為減低，這是全社會都不想見到的。

高鐵採取「一地兩檢」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在不少國家及城市，都採取「一地兩檢」模式，正正就是着眼於便捷與效率，包括現時的深圳灣口岸。其實，現在西九龍高鐵站採用的「一地兩檢」，也是沿用深圳灣模式，只是兩地角色調換，深圳灣是內地租地予香港執法人員進駐，西九龍則是香港租地予內地執法人員進駐。既然深圳灣「一地兩檢」實施了這麼多年都沒有出現大問題，正說明「一地兩檢」是行得通，也得到市民的好評，這樣西九龍站為什麼就不能實行「一地兩檢」？

具堅實法律依據

「一地兩檢」的問題，是法律問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記者會上已提出會採用「三步走」方式實施「一地兩檢」。這「三步走」具有堅實的法律依據，基本法第95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所以，特區政府完全有權進行有關法律的合作，而深圳灣模式亦已提供了先例。這些都說明「一地兩檢」在法律上並沒有可質疑之處，反對派不斷指稱違反基本法，完全是斷章取義，企圖誤導市民。

「一地兩檢」並非新鮮事物，在不少國家及地區都有採用，例如穿梭英國、法國與比利時的歐洲之星，再如美國與加拿大等，都設有「一地兩檢」的安排。國與國之間尚且可以做到「一地兩檢」，何況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內地？香港本身就是中國的領土，請問反對派口中的「割地論」所割的是誰人的地？為什麼國與國都可以解決的法律問題，反對派卻要上綱上線？這不過是反映了反對派根深柢固的抗中思維，這才是「一地兩檢」的眞正癥結。高鐵是香港人的高鐵，高鐵發揮成效市民都能獲益，相反以抗拒「一地兩檢」來搞垮高鐵，全港市民都是輸家，這些損人不利己的行為，盡顯反對派居心險惡，理應受到市民的譴責。

否定蔡若蓮於法無據

金屏礎

衆議園

教協向林鄭取得了36億元教育公帑之後，提出條件，如果林鄭月娥任命蔡若蓮當教育局的副局長，那就等於是「宣戰」，要求林鄭回應訴求，另覓教育局副局長人選。不過，最新消息是，蔡若蓮暫時是教育局副局長唯一人選。

這涉及了怎樣選局長或者副局長的標準問題。

尊重特首委任官員的權力

「泛民」的論點是非常清晰的，葉建源曾經在選舉功能組別勝過了蔡若蓮，所以，蔡若蓮就沒有資格擔任副局長。第二個理由是，蔡若蓮出身於教聯會，屬於親中的組織，所以不能當副局長。這些理由，其實是把選舉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選擇自己的班子的權力產生制度，弄混淆了。

選舉立法會議員，是按票數決定高下，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官員職位是實行委任制，決不是選舉產生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官員是由選舉產生的。有一些國家實行三權分立的制度，例如美國，官員由美國總統提名，要經過議會的審議和批准，但是，副手則不必經過議會的審議和批准。香港並不是一個國家，更加不會實行美國式的三權分立，所以基本法載明立法會並沒有審議和批准官員任命的權力。

香港的主要官員，行政長官提名之後，要經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副局長則不必經過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行政長官班子的人選，最重要的是要和行政長官的理念一致，可以緊密合作，有工作能力，並且有豐富的專業經驗，人格良好。在這一方面，蔡若蓮是符合副局長的任命要求的。

蔡具經驗能力

蔡若蓮從事教育工作20多年，從品格、工作能力到專業經驗，都符合副局長的要求。她本來是教育局的官員，先後擔任高級課程發展主任及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負責校本課程及語文教學支援工作，組織學生口語才藝活動、香港文學散步，落實初中融辯入教計劃、支援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等。蔡若蓮在2013年9月才到福建中學（小西灣）接任校長一職，至今共工作了三年半。2015年，蔡若蓮聯同一班香港教育界人士成立了教師夢想基金，並擔任基金主席，這個基金會的工作方向就是要解決香港教師的工作量繁重，加上教改、縮班殺校的壓力，令其失去追尋夢想的動力的問題。蔡若蓮的優點是，既有教育局工作的經驗，更重要的是非常了解前線教師的難處，熟悉教學的實際，了解學生的需求。

但是，「泛民」卻因政治派別不同而反對蔡若蓮擔任副局長，甚至提出若果蔡若蓮擔任副局長，就會全面反對特區政府的施政，變成「有偈傾」。社會大衆就會覺得非常奇怪，如果整個社會對於官員的任命，都作出政治審查，那麼，張炳良、羅致光、陸恭蕙，就不可能擔任局長和副局長了。社會就會出現更大的撕裂。

「泛民」一方面說要「實現大和解」，另一方面，只許「泛民」當官，不准親中人士當官。這樣就會挑起社會的對立，不利於整個社會的合作。

行政長官任命官員的權力，應該受到尊重。「泛民」不應該出難題，製造障礙。如果施政出現缺點，提出批評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在行政長官委任官員的問題上，左右大局，提出條件，就有越權的嫌疑了。

當前的民意是，要在香港建立一個和諧合作的社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任何人當官，都必定是執行林鄭月娥的政治路線，落實她的政治綱領。所以，林鄭月娥考慮人選的選擇權，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行政長官才知道自己需要怎樣的官員，能夠落實自己的施政目標。因此，在選擇官員的問題上，不應該越位越權，更加不應該「泛政治化」。

「泛民」應該腳踏實地，多提出有建設性的提議，減少為特區政府製造麻煩和對抗，這才算是反映民意。

學生家長和廣大學生，也是教育服務的持份者，教協不必因為自己擁有9萬會員，把自己說成是唯一的持份者，可以決定教育局長或者副局長的人選。過去選擇官員的歷史並非如此，特區成立後的教育局官員的任命，也非如此，基本法也沒有如此規定。

23條本地立法不宜遲

李幼岐

港事講場

「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這一句話，已經聽到不少大人物（包括高官）說過很多次了。可惜，說來說去，始終仍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相信許多愛國愛港人士都想問聲：「點解？」

撥亂反正 正本清源

香港回歸20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亂象甚至亂局，包括「佔中」及旺角暴亂。認眞思考原因，23條未有本地立法顯然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以「佔中」為例，錢從何來？也就是長達79天的「佔中」活動的經費和資源何來？一卡車、一卡車的日用品、帳篷、睡具、以至竹枝、木板等，又是誰付錢購買及僱車運到「佔中」現場？有消息指，發動「佔中」的「三丑」之一的戴耀廷，背後有美國大炒家索羅斯的金錢支持，這是怎麼一回事？至於「佔中」發起人和多名反對派議員收受黎某人5位數、6位數的支票，證據確鑿，卻至今不控、不審、不判，這又是為了什麼？凡此種種，是否都與23條尚無本地立法有或多或少的關係？

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底至「7·1」視察香港，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其中提及以至強調「國家主權和安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等。這些，都與香港的亂象、亂局、亂源有關。可以說，也與香港尚未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有頗大的關係。香港是法治地區，萬事都要有法可依。施政要依法，執法要依法，司法要依法。政界人士以至普通市民行事，亦都要奉公守法。23條尚無本地立法，法治就有了缺口，某些人會鑽空子為所欲為。大衆不妨想一想，為什麼有些反對派人士極力反對23條本地立法？原因顯而易見：反對派不想戴上「緊箍咒」，他們膽大妄為，想做就做。假如有了第23條的本地立法，反對派肯定失去「反中亂港」的自由，香港無疑就會太平得多。

不必強求取得共識

關於23條本地立法，近期有一種論調，那就是：要在社會上取得共識，然後再就23條進行本地立法。此說有一「奇」：為何過去的種種立法都不必事先在社會上有什麼「共識」，偏偏只有23條本地立法有這個需要？你說，「奇」也不「奇」？此則令人懷疑，可能是不想及時或及早立法的人採用「曲筆」的方式作表達。其次，「取得共識」云云，難矣哉！

許多事情，要取得共識都有不小的難度。舉例說，新一屆政府希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問責官員多些到立法會接受質詢，其中建議的「短問短答」，就有人支持、有人不支持，甚至有人先支持後不支持。「共識」，云乎哉！相比之下，是否就23條本地立法，要取得共識難度肯定大得多了。說得「酷」一些，10年20年都未必能「取得共識」，那就10年20年不用本地立法了？也就不用「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了？

很明顯，「事先取得共識」的說法，大有商榷的餘地。事實上，許多法例在立法前都不會考慮什麼「社會共識」。「官員共識」、「議員共識」或「起草法例人員共識」很可能是有的，至於「社會共識」，恐怕只能「估估吓」了。不過，假如法例立法成功，不論是否有「共識」，人人都得遵守。

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只須立法會出席議員的過半數即可通過。比之於「政改」議案等須三分之二的大多數方可通過，難度相對小得多。現時，立法會的生態，建制派佔40席，反對派或非建制派佔24席，尚有6席等候補選。形勢對23條的本地立法顯然十分有利。此時不做，更待何時。即使是補選6席仍歸反對派，雙方席位還是40比30。如此比例，對23條本地立法絕對有利。機不可失呀！

應該說，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是大事，也是急事，有助於改善因「反中亂港」而造成的社會混亂局面。這是大有利於香港社會和廣大市民的大好事，何樂而不為？簡而言之，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是大事，宜早不宜遲。

香港應發展體育產業

青年民建聯主席 顏汶羽

參政議政

這幾個月，香港舉辦了好幾場體育比賽，門票全都是迅速售罄、一票難求。有英超亞洲盃、香港世界桌球大師賽、世界女排大獎賽香港站、NBA明星隊來港與CBA明星隊對賽等等，售票的情況足證香港市民對體育運動的熱切期望。

實際上，香港市民除了支持世界各地的體育好手來港獻技外，亦十分支持本地運動員，每逢大賽事都有極多市民支持香港運動員，正正反映出體育運動是最能團結市民的活動。

體育除了是運動競技外，更是一種產業，其衍生的行業衆多，餐飲、娛樂、零售、酒店、交通等，實際上是一項盛事式的活動。若香港的體育活動能進一步加強職業化、專業化，加上相配的活動宣傳推廣，的確可以產生可觀的經濟效益。

筆者早陣子入場欣賞了英超亞洲盃，香港大球場全場四萬座位座無虛席，人頭湧湧，連入場也要輪候一段時間。香港作為國際化的城市，交通便利，資訊流通，是舉辦世界體育盛事的理想地點。香港應該積極爭取更多體壇盛事在香港舉辦，透過世界各地的高水平比賽，提升香港的體育水平。

假若有天香港能舉辦世界盃、F1賽車等世界最高水平的運動盛事，當有助香港維持國際城市的地位。當上海、新加坡也舉辦F1賽車，日、韓也曾合辦世界盃，香港在這方面未免落後。現在，香港要提供足夠的硬件設備，如足球場、籃球場等等，以期爭奪舉辦權。

香港電影的鄉愁和共融

香港華菁會常務副秘書長 黃赫男

八面來風

香港文化是中華文化血脈的一支，但作為開放的國際化都市，她又融合了多元文化形態，在醇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下，展現出現代化的活力與激情。而香港電影是香港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香港電影所承載的文化和獨有的拍攝手法，對內地的受衆群體及電影人都有深深的、無法抹去的影響。

對祖國的鄉愁

香港電影影響了一代內地人，總有那麼幾部香港影片深深地鐫刻在內地觀衆的記憶中。老一輩香港電影人塑造了諸多經典，他們的作品讓人驚豔：發哥演繹的角色已經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記憶；成龍、李連杰都是以命相搏的功夫巨星；星爺永遠是人們心中當之無愧的喜劇之王。香港電影承載了觀衆太多的記憶、情感和歲月，伴隨着你我和這個都市慢慢成長，在時光隧道裏留下穿梭的印痕。

香港電影與內地的這種緊密相連，除去語言的無礙，文化內核的相似，還因為香港電影與內地之間脫離不開的血脈聯繫。香港著名電影人吳思遠說：「香港電影是中國電影的傳承發展，早年的香港電影承載了很多流居世界各地的華人的鄉愁。起初，香港的片場人員基本上都是內地尤其是上海過去的，上海話是片場的主流話語。香港電影的起步跟內地電影是分不開的。」是的，香港特殊的歷史際遇注定讓香港電影人承受着更多深沉的鄉愁。早期的香港移民來自於上海、福建和廣東一帶，香港電影中始終都存在着對這些地域的描述和呈現，浸潤着大多香港人對內地生活的回憶。這種懷舊情結，隨着時代變遷逐漸成為香港電影的獨特元素。在回歸前後，香港電影在保有本土特色的同時，又取得了不俗的藝術昇華，其根本就在於回歸前後，香港電影對於這種離愁別緒的表現更加充分和深入。《玻璃之城》、《三城記》、《半生緣》、《黃金時代》……時代的變遷和香港人自我認知的變化，在這些電影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許鞍華是香港「新浪潮」時期出現的著名女導演，也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導演之一，她出生在內地，之後長期居住在香港，她的電影保持了對香港社會、歷史、現實及文化的敏銳觀察和深刻反思。《半生緣》是許鞍華創作於香港回歸前一年的作品，電影借由張愛玲的小說，將中國近代社會的多重歷史事件交織陳述，展現了衆生男女在世事變幻中脆弱而又無奈的選擇。影片中有揮之不去的對故土、民族和祖國的鄉愁，也有對未來的忐忑不安，是向記憶中的香港道別，也在等待一個充滿未知的新時代。

與內地的共融

回歸後的香港電影展現出新的面貌。有人形容，回歸之前的香港基本處於一種「無根狀態」，藝術作品中呈現的是一種顛沛流離的狀態。回歸後，香港電影則產生了巨大變化。

尤其是2003年，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了《內地和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的安排》（CEPA），其中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的條款放寬了，香港電影從此變得日益蓬勃起來，隨即也開啓了新一輪的「合拍」歷程。在這一背景下，內地市場對香港電影的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在發行方面，合拍片享有與內地電影相同的市場待遇，美國電影在內地的分帳比例是25%，合拍片則跟內地電影享受同等待遇，片方的分帳比例可達43%。合拍片的限制也越來越少。以前合拍片對於演員比例等相關規定非常嚴格，現在有些規定已經放寬，有些限制則已經取消，更利於合拍片的發展。另外，由香港電影人獨立拍攝的港產片在內地發行，以前要經過繁複的手續，現在則簡化很多，尤其是有關部門推出多項措施，簡化了粵語港產片在廣東地區發行的程序，給粵語港產片引進廣東地區帶來更多便利。2003年至今的十幾年間，香港電影確實走出了一方新的天地，合拍片更是成就斐然。合拍片的數量從2003年全年26部增加至2016年全年43部，而2016年全國電影票房前十名中，合拍片佔有半壁江山。

如今，香港電影「北上」已經成為風潮，從最開始的「水土不服」到後來被認為融合乃興盛之道，這一變化體現的是香港和內地一脈相承的文化認知和包容。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曾表示，兩地合拍片令香港電影人感覺一下子世界擴大了很多，創作空間大了很多，市場大了很多，總體來說非常的正面，以前內地市場沒有開放的時候，電影人的目標只鎖定在本土幾百萬人和海外華人。香港和內地聯繫越緊密，文化交流越頻繁，香港對內地的認同就越加提升，在這種互通包容下孕育出了具有新時代精神的香港電影，也眞正實現了兩地電影的互利共贏。

（轉自《紫荆》雜誌，2017年8月號）

周星馳的合拍片在內地頗受歡迎。